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古代印度哲学与东方文化研究

黄心川◎著

非
外
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ZHONGGUOSHEHUIKEXUEYUAN XUEBUWEIYUAN ZHUANTI WENJI

古代印度哲学与东方文化研究

黄心川◎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印度哲学与东方文化研究/黄心川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9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ISBN 978-7-5203-2781-7

I. ①古… II. ①黄… III. ①古代哲学—研究—印度②东方文化—研究
IV. ①B351.2②K1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54372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琪 黄燕生
责任校对 朱妍洁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36.75
插 页 2
字 数 565 千字
定 价 16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 编辑委员会

主任 王伟光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伟光 刘庆柱 江蓝生 李 扬

李培林 张蕴岭 陈佳贵 卓新平

郝时远 赵剑英 晋保平 程恩富

蔡 昉

统筹 郝时远

助理 曹宏举 薛增朝

编务 王 琪 刘 杨

前 言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能力和成果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哲学社会科学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对建设和形成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的进程中，根据党中央关于把中国社会科学院建设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殿堂、党中央和国务院重要的思想库和智囊团的职能定位，努力推进学术研究制度、科研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创新，2006 年建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即是践行“三个定位”、改革创新的产品。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一项学术制度，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领导下依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章程》运行的高端学术组织，常设领导机构为学部主席团，设立文哲、历史、经济、国际研究、社会政法、马克思主义研究学部。学部委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生荣誉。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荣誉学部委员增补，现有学部委员 57 名（含已故）、荣誉学部委员 133 名（含已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养深厚、贡献突出、成就卓著的学者。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即是从一个侧面展示这些学者治学之道的重要举措。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下称《专题文集》），是中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主持编辑的学术论著汇集，作者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内容集中反映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在相关学科、专业方向中的专题性研究成果。《专题文集》体现了著作者在科学研究实践中长期关注的某一专业方向或研究主题，历时动态地展现了著作者在这一专题中不断深化的研究路径和学术心得，从中不难体味治学道路之铢积寸累、循序渐进、与时俱进、未有穷期的孜孜以求，感知学问有道之修养理论、注重实证、坚持真理、服务社会的学者责任。

201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作为实施创新工程的重要学术平台，需要在聚集高端人才、发挥精英才智、推出优质成果、引领学术风尚等方面起到强化创新意识、激发创新动力、推进创新实践的作用。因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主席团编辑出版这套《专题文集》，不仅在于展示“过去”，更重要的是面对现实和展望未来。

这套《专题文集》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学术出版资助项目，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学部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这套《专题文集》给予的学术评价。在这套《专题文集》付梓之际，我们感谢各位学部委员、荣誉学部委员对《专题文集》征集给予的支持，感谢学部工作局及相关同志为此所做的组织协调工作，特别要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为这套《专题文集》的面世做出的努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专题文集》编辑委员会

2012年8月

我与东方哲学、宗教研究(代序)

1928年我出生在江南历史文化名城——常熟的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曾随乡间的母亲参加过一些田间劳动，因之对农民的艰辛有些切身体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随父亲去常熟城内县立中学读书，寄宿在学校内，渐渐懂得社会上发生的各种事情。当时正是日寇铁蹄统治下的年代，常熟地区既是新四军在江南的一个据点，也是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争夺的要地，因此在学生中也受到影响，明显地分成两个对立的阵营。我在中学时曾经协助一些地下党员创办过一个反日、反蒋的名叫《啸》的刊物，使我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6年，我在家乡读完中学后，考入了美国在华创办的一所教会大学——杭州之江大学文学院，在那里比较系统地接受了西方的文学、哲学的知识，受到了西方文化的熏陶。这个学校在中国创办已有100余年的历史，学校的教育措施等完全是按照美国大学的模式设置的，甚至连中国的历史文化课也是用英语来讲授的。在这样的环境下，一方面使我感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抱残守缺，要借鉴西方现代化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激起了我对殖民主义文化的反感。当时国民党正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内战，因此蒋管区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而官僚地主资产阶级却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即便是居住在杭州“天堂”里的老百姓也感到活不下去，发生了抢米风潮。在学生中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和反迫害等学潮。我亲眼目睹了这些，并且参加了一些反对国民党的学生活动和群众运动。通过这些活动，我逐渐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残酷和反动本质，为国家的前途担心，也为我自己的学业和前途忧虑。当时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路是逃避中国的现实，出国深造。那时适逢牛津大学在杭州招生，我曾经报名并被录取。另一条路是投入革命的洪流，把自己的前途和祖国的命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大学地下党的教育帮助

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我终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8年我越过国民党的军事封锁线，历尽千难万险，到达苏北游击区革命根据地，成为一名游击队员。以后又参加了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1950年美国发动朝鲜战争，我又参加了志愿军的队伍，担任某兵团司令部的英文参谋。后在第五次战役中负伤，左足残废，因此不得不离开我热爱的战斗队伍。之后转业到地方，在江苏高级法院、鞍山钢铁公司等单位任职。直至1957年我到北京大学学习。虽然这些经历都为时不是很长，但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我后来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帮助，其中最主要的是使我懂得了社会现象是极复杂的，研究问题必须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当然这种种经历也给我带来了某些先天的、书本知识的不足，激发我更加努力学习，奋勇前进。

我的家乡是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文人墨客辈出，中国很多著名的文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都诞生和活动在这里，他们的思想和业绩使我羡慕和向往不已。在我上中学时，就萌发了要做一个人文学者的愿望，这也是我进入大学文学院攻读的动机。我参加革命后，虽然无法选择自己的职业，但想当一名学者的愿望一直未能忘怀。在工作之余，我一直在研读外国的哲学和文学著作，并且作了大量的笔记。我常常把革命看成是一首“社会的诗”，革命的理想是诗的理想，革命的生活是一种饶有诗意的、浪漫主义的生涯，因此无论受到什么痛苦和困难，都怡然自得。1956年党中央提出向科学进军，我怦然心动，报考了北京大学外国哲学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此走上了学术道路。在北大哲学系，我师从任华、汤用彤、朱谦之、洪谦等老一辈的哲学家，学习古希腊哲学和印度哲学，并且从头学习了希腊文、梵文，等等。这些老一辈哲学家现在大部分都已过世了，但他们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感谢这些老师传授给我知识，并且教导我做人的道理。例如汤用彤老师身患重病，在他逝世前一段时间，还给我和几个研究生讲解佛教的经典——《入阿毗达磨论通解》和《俱舍论》的要义。我入北大当研究生时已届“而立”之年，离开学习生活已很久，开始学习时感到有些吃力，与同学相比，深感自己的基础知识不足，有些自卑。但经过加倍的努力，最终克服了学习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完成了学业。1958年，我留在北大哲学系任教，从此实现了我梦想的学者生涯。此

后30年我一直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国佛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东方哲学、宗教的教学与研究工作。60年代参与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世界宗教研究所的组建工作,70年代负责筹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北京大学合办的南亚研究所,80年代领导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90年代筹备成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东方文化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中心,另外,也参与了陕西社会科学院的长安佛教研究中心、中国玄奘研究中心等宗教研究机构的建立。

我之所以选择外国哲学史专业,是经过长期摸索和实践做出的。在中学时虽然接受的是现代化的教育,但由于江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影响,教学内容更多的是中国传统的经术和文化。在中学里担任语文和历史老师的,有的是清朝的遗老宿耆,例如有一位名叫蒋韶九的老师是前清的举人、民初国会的议员,他要我们学习四书五经,不许我们读、写语体文,遭到一些同学的反对,引起了骚动。有的老师是江南文坛的骚人墨客,如批写“才子书”金圣叹的后裔金老佛等。金先生在讲授语文时从不用教本,只是教授他当场所作的诗词歌赋。在这些老师的熏陶下,我也跟着学习写骈体文,吟诗,唱道情,在生活上也受他们落拓不羁、玩世不恭的影响。这些思想和生活态度在我进入大学和研究生阶段,结识一批名流教授后,还时时有所表现。之江大学办学的宗旨虽然标榜要“阐扬东西文化”,但教授的都是全盘西化的内容,其中还夹杂着一些殖民主义的洋奴思想,因此在我头脑中又添加了不少从柏拉图到尼采的超人思想。由于当时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指导,缺乏认识和批判能力,在我头脑中装满了大堆东西方杂乱无章的思想,这些思想直至我参加革命,接受马克思主义,逐渐建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后,才逐渐加以澄清。后来我认识到对待学术中的古今、中外、东西方等问题要有一个正确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一个指导思想。

我留北大后最早讲授的是西方哲学通史,以后又扩展到印度哲学史、日本哲学史专题,乃至整个东方哲学史。1964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后基本从事东方宗教哲学史特别是印度哲学史、印度佛教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由于教学工作的需要,我撰写了不少东西方哲学史、印度哲学史、日本近代哲学史等教科书和专题研究的著作。这些成果由于在我国还是最初的尝

试,因此质量并不是很理想。但是这些著作与国外通用的教科书相比也有着一些特点:首先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哲学和历史的比较方法对东方哲学史上的三大体系即印度哲学、阿拉伯哲学及中国哲学的历史演变过程、特点、规律、社会作用以及当前发展的趋势等都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对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合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传统、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民主和科学的思想竭力加以发掘、阐扬;同时对那些已经死亡或者陈腐的极端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宿命论等作了恰当的、合乎历史主义的评价,特别是对那些目前在很多东方国家仍奉行的思想体系如实地作了分析和批评。这些著作在挖掘东方哲学文化遗产的同时,也对长期在国内外思想界、学术界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教条主义进行了认真的批判。另外,也注意到了在近代历史条件下,东方哲学受到西方哲学的冲击或者与西方哲学思想融合以后出现的种种新形式。其次对东方哲学与我国的关系作了比较系统的梳理。东方不少国家是我国的近邻,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与我国有过全面的或者某些方面的交流,在不同程度上受过我国的影响,因此在撰写时首先整理了我国保存的东方国家的哲学资料,由粗及细,推陈出新,弘扬其精华,批判其糟粕。另外,力图在平等的、双向交流的基础上,揭示东方邻近国家对我国的影响,在叙述中国哲学对邻近东方国家的影响时也注意其变化和发展,特别是与当地哲学文化融合的民族化的过程。

在东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中,我先后写作了19部著作、140余篇论文,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印度哲学史》《印度近、现代哲学》《印度佛教哲学》《现代东方哲学》(主编及作者)、《东方哲学家评传》(五卷本,主编及作者),后两部著作是在1999年以后出版的。这些著作对东方各国哲学的历史和现状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搜集了极其丰富的史料,特别是我主编的《现代东方哲学》及《东方哲学家评传》是集中了我国研究东方哲学的主要力量而编纂出来的,这些书的出版也可以说为我国现代东方哲学的教学与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填补了空白。另外,日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为了纪念《中日和平条约》签订25周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于1999年翻译、出版了我的论文集《东洋思想的现代意义》一书。该书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主要内容包括:东方哲学的模式、范围和

现代转型,中国与周边国家哲学的双向交流及其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与东亚文化模式,东西方哲学的交流与融合,亚洲价值观及其现代意义。此书的出版在日本和中国都受到了欢迎。

在中外哲学与文化交流方面,我发表过不少的著作和论文。其中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发表的《印度近代哲学家辨喜研究》一书。该书出版后,其中主要的章节和全书摘要被译成英文和孟加拉文。印度、孟加拉的很多报刊进行了转载或加以评论,其中“辨喜论中国”一章曾被编入印度罗摩克里希那文化学院出版的《世界思想家论罗摩克里希那和辨喜》一书(1983),印度驻华大使馆、印度亚洲协会(前亚洲皇家学会)、罗摩克里希那文化学院在中国和印度分别为该书召开了专题报告会。在1962年《北京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安藤昌益与“自然真营道”》是我国最早对日本这位“被遗忘了的哲学家”的研究论文,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重视。另外,在日本东京大学讲演的《朱舜水的学术思想及其在日本的交流》,在印度德里大学所作的《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的报告,在韩国“中韩论坛”第三次会议上讲演的《中韩文化的共同性及其相异性》的讲演,在中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上所作的《“三教合一”在中越发展的过程及其特点》的报告等都在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引起了反响。

在东方宗教研究中,我涉猎的面较广,对佛教、印度教、耆那教、摩尼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都有一些著作或论文发表,但重点还是在印度佛教和印度教方面,这类研究的成果集中概括在我主编和撰写的《世界十大宗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亚太地区的宗教》等书中。我和戴康生等同志撰写的《世界三大宗教》是在改革开放伊始由中国学者首先介绍世界宗教的一本小书。这本书现在看来,无论其内容还是学术性方面都有所欠缺,但在当时确实起过号角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宗教的研究已经恢复。《世界十大宗教》曾获1988年全国十大优秀图书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综观东方宗教的研究,有着如下一些特点,首先是在我国开拓了不少外国地区的宗教、新兴宗教的研究。1949年以后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我国对宗教的研究局限于传统的世界三大宗教历史、理论的研究。我力图改变这种情况,在《世界十大宗教》中组织了当时国内很少重视的神道教、锡

克教、耆那教、印度教、婆罗门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宗教情况的编写工作。在《亚太地区的宗教》中又填补了1949年以后宗教研究一直空白的尼泊尔、朝鲜、蒙古、中亚及大洋洲等国家和地区的宗教。当然，这些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和遗漏，但毕竟填补了空白。

其次，在研究中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不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去揭示各种宗教的形成和发展，同时也注意运用现代人文科学所取得的成就和新方法。例如根据比较神话学与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探索了琐罗亚斯德教的起源以及澳大利亚原始宗教的现状，运用比较民俗学、比较历史学等方法研究古代埃及宗教的演变及其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从文化史的角度，不仅探讨了古代西亚与地中海东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深化了对犹太经典的研究，而且也审视了亚太地区东西方宗教和文化的融合与冲突情况，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和多元文化的角度去观察和研究宗教问题。宗教研究的目的归根结底是要为现实的政治和社会文化服务，因此要密切地联系实际。《世界十大宗教》《世界三大宗教》《亚太地区的宗教》之所以被人重视，就是因为这些书中涉及的各种宗教问题都是针对当前世界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国际关系、民族问题，东西方文明融合与冲突等提出的，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

再次，在上述各种研究中，特别注意世界各大宗教和地区宗教与中国的关系，探索外国宗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与中国民族文化的结合及其变化，对中国社会、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等。例如我早年发表的《沙俄利用宗教侵华简史》一书，着重阐述了1860年以前俄国东正教与早期中俄的外交关系，揭露了沙俄利用东正教、喇嘛教和伊斯兰教侵略中国的种种事实。在《印度佛教哲学》《中国密教的印度渊源》和《印度教与中国》中阐述了佛教、印度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印度佛教派别与中国佛教发展史的关系，印度宗教对中国文化、艺术、科学和瑜伽术等所起的影响。

在宗教专题特别是宗教理论、中国与东方各国的宗教关系等方面，我也发表过一些论著。在宗教理论方面，主要的有我与罗竹风同志合作撰写的作为《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导论的“宗教”词条、《中国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在“宗教”词条中关于中国宗教的特点作过如下的概括。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和多宗教的国家……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宗教象西方那样占有“国教”的地位;历代统治阶级对于各种宗教大多数采取支持、保护的宽容政策。就宗教徒的人数而言,在全国范围的总人口数中,历来居少数。……宗教在民族地区人口中,至今仍占绝大多数。

占中国人中大多数的汉族,以天命崇拜和祖先崇拜为民族宗教观念的主要传统,因而佛、道的信仰从来未占过统治的地位。……华夏民族由于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因此,中国宗教观念从一开始就把上天的风调雨顺和下民勤劳耕耘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把天或神的意志和人的意志放在同一地位上。周代以后,儒家主张以德政治天下,敬天而不信天。“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的“神道设教”思想,在中国一直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王权高于神权。……华夏民族由于农业耕作和水利事业促进了血缘关系的联系和发展,在周代就形成一套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社会制度和“孝为德本”的道德规范。体现宗法制度的祖先崇拜,数千年来渗透汉族的每个家庭之中……另外,儒家的重视人的现实关系和利益的伦理观念使汉族形成了务实的特点,而且影响着中国宗教徒的面貌:有时信,有时不信;有事就信,无事就不信。为了求得庇佑,不论是儒释道……都可以信仰。由于宗法社会制度和儒家重视道德伦理的思想同崇拜超人力量的宗教观念存在一定的对立,因此,正统的儒家文化必然对于宗教的社会作用起抑制作用。

《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自1988年出版以后,其中不少章节受到了读者的批评、指正,引起了不少争论,但这个“导言”迄今为止还未听到异议,我想我们这个概括还是有很多局限性的,我诚恳地希望读者加以批评、补充和修正。

《隋唐时期中国与朝鲜佛教的交流——新罗来华佛教僧侣考》是在1978年中韩建交前中国宗教学会在西安召开的一次佛教会议上发表的,中韩建交后引起韩、印学者的注意。该文被译成韩文和英文,经大韩传统佛

教研究院推荐，并经日本、韩国著名学者中村元、镰田茂雄、闵泳圭等人投票，获得了1993年国际佛教学术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成果奖。该文根据中韩史籍，详细考证出在隋唐时期新罗来华的僧侣共117人，这个数字比韩国学者李能和统计发表的65人，日本学者中吉功在1974年统计发表的66人多了近一倍。国际佛教学术奖自1978年设立以后，共颁发过四次，计日本两人，韩国一人，中国一人。我的获奖标志着中国佛学的研究已经与世界学术接轨，中韩传统文化的交流再一次获得重视。

以上是对我的东方哲学、宗教研究概略的介绍，从这些介绍中可以看出，如果我有一些可喜的成就的话，那是与周围的同事、学生的努力分不开的，我是依靠集体智慧和努力才能完成上述种种任务的。

另外，我对我国东方宗教、哲学的研究还想说一些多余的话。

世界文明是从东方开始的。远在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中国的黄河、南亚的印度河和恒河、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这四大流域就孕育了世界最早的文明，也产生了人类最早的宗教哲学思想。目前世界上公认的自成系统的四大哲学体系中的有三个在东方。东方宗教哲学不仅在东方内部，而且也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长期的交流，对世界宗教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宗教哲学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开出了绚丽多姿的花朵，在我国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当前东方宗教和哲学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着21世纪的黎明。随着东方各国，特别是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的高速发展，东西方文化频繁的接触和交流，东方的宗教哲学思想在世界上将起着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受到世界舆论界、学术界的瞩目。因之，有人认为21世纪是“亚太的世纪”或“东亚文明的世纪”。美国著名的政论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未来的世纪不是按意识形态或国家来划分，而是按文明来划分，文明主要指的是宗教，文明的差异是将来世界发生冲突的根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国际政治的主线，儒教—伊斯兰教将成为非西方文明的主要威胁。虽然我们不能同意亨廷顿的这个观点，但它确实提出了一个新的观察世界政治、经济的视角，承认文化因素，特别是人文的精神因素、宗教信仰、哲学伦理价值观等将对经济社会所起的推动作用，因此我们对东方宗教、哲学的研究不

仅有着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而且也有着迫切的现实意义。

东方宗教与哲学研究在我国是一门既古老而又簇新的学科。我国古代对东方各国宗教哲学思想的研究,有着悠久的传统,积累了大量丰富的资料,写出过蔚为大观的著作。例如从公元2世纪至12世纪的1000年间,我国翻译的属于印度次大陆的佛教经律论三藏共计1482部,5000余卷,这些佛典不仅记载着佛教,而且记录着次大陆的历史文化和其他宗教哲学派别的内容。法显撰的《佛国记》、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等是迄今为止研究印度次大陆和中亚地区宗教哲学的第一手资料。我国历朝编写的“二十四史”中都有关于东方各国历史、文化的记录,因此,中国的资料是十分丰富、翔实和弥足珍贵的,这对于整理发掘东方精神文化的遗产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

1949年以后,我国对东方邻近国家宗教哲学的教学研究一直是宗教、哲学学科中最薄弱的环节,目前仍处于开创和摸索的阶段,与国外近年来东方学蓬勃发展的情况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我们的研究人员、队伍数量少,质量差,远远不能适应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为此,我们一定要利用我国的优势,发扬学习和研究外国历史文化的传统,积极培养和充实年轻学者的队伍,开展多方位和多学科的研究,为我国当前的精神文明建设、国际文化战略和友好睦邻政策服务。

(原载《常熟文史》第二十九辑,2001年)

目 录

东方哲学

《东方著名哲学家评传》总序	(3)
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的宗教趋向	(48)
世界宗教圣地的形成、发展及其历史意义	(51)
文明对话与文化比较	(65)
佛教是维持亚洲和平与繁荣的一种重要力量	(67)

印度哲学与宗教

当前南亚宗教发展的趋势与特点	(71)
汤用彤对印度哲学研究的贡献	(80)
古代印度、希腊原子论的比较观	(92)
邪命外道考	(106)
印度的吠陀经	
——读恩格斯关于宗教定义的一些体会	(125)
印度吠檀多哲学述评(上)	(142)
印度吠檀多哲学述评(下)	(161)
印度弥曼差哲学述评	(177)
印度正理论的哲学和逻辑思想	(203)

从纳奥罗吉、罗纳德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看印度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特征 (223)

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的宗教和社会思想述评
 ——纪念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逝世一百周年 (242)

甘地哲学和社会思想述评 (253)

赛义德·阿赫默德·汗的宗教和哲学思想述评 (274)

印度奥罗宾多·高士的哲学和社会思想 (282)

试论龙树的中观哲学 (303)

试论印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哲学思想 (313)

印度的胜论哲学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330)

印度古代唯物主义
 ——顺世论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355)

印度教与中国文化 (372)

中韩文化

中韩文化的共同特征及其相异性 (385)

当代中韩佛教天台宗研究的前顾与后瞻 (392)

韩国禅教史前言 (396)

民国佛教刊物所见当代韩国佛教史料摭议 (410)

中国宗教

中国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425)

现代中国佛教 (433)

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朱谦之先生 (447)

论玄奘精神 (458)

玄奘及唯识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463)

关于玄奘与紫阁寺的几个问题 (472)